

抗战时期中共参与新疆治理探析

付 娟 王 洪 运

(四川音乐学院 思政部,四川 成都 610021;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225)

摘 要:抗战时期,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实行亲苏亲共政策,为中共参与治理新疆提供了契机。以毛泽民等为代表的中共党员在新疆的探索实践,不仅对抗战建国有重要意义,还有益于建国后的新疆治理,为中共日后将战略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了宝贵经验,也是建国前中共第一次大规模介入多民族边疆地区治理的早期实践,开中共探索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之先河,具有超乎新疆辐射全国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意义。

关键词:抗战;中共;新疆;治理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9)06-0033-08

doi:10.19742/j.cnki.50-1164/C.190604

新疆地区幅员辽阔,自古为东西方交通枢纽、中国西北地区要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历代中国政府都极为重视治理新疆。虽然新疆1949年才宣告和平解放,但中国共产党对新疆治理的探索却早于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盛世才主新初期(1937-1942年),在新苏友好、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大背景下,以毛泽民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共党员因缘际会进入新疆,开启了中共治理新疆的早期探索。在长达五年的时间内,从地方到省城一百余名握有实权的共产党员为建设新疆尽心竭力,取得了显著成效,入疆共产党员参与治理的1937-1942年恰是民国新疆社会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尽管这一时期新疆取得的建设成就与盛世才的亲苏政策及苏联的大力援助有关,其目的也是为巩固其独裁统治,但不能就此否认中共党员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许多有关民国新疆历史的著作与论文虽有所涉及,但尚无专文探讨,也缺乏对其意义的客观评价,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做一个较为全面的阐述与评价,抛砖引玉以待方家批评指正。

一、中共参与治疆的历史机遇

(一)缘起:盛世才主新与亲苏政策

1933年“四一二”事变后,金树仁逃离新疆,新疆陷入盛世才、张培元和马仲英三方激烈斗争的局面,当年12月,张培元、马仲英反盛同盟正式形成,而南京政府想借此机会牵制盛世才,掌控新疆。为获

收稿日期:2019-05-21

作者简介:付娟(1973—),女,历史学博士,四川音乐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思想政治理论和中国城市史。

王洪运(1973—),男,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思想政治理论。

基金项目: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局限、缓慢、单一:1840-1949新疆城市发展研究”(15XJA770001);2016年四川省教育厅资助重点科研项目“抗战时期边疆地区的城市变迁——以新疆为例”(16SA0119)。

强邻苏联的军事支持,盛世才打出亲苏反帝旗号,声称信仰共产主义。对当时的苏联而言,扶持一个亲苏的中国新疆地方政权既可确保中苏边境安全,还可获得工业化所需的农牧产品及广阔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因此苏共很快通过《关于新疆工作的指示》,并表示“给予乌鲁木齐提供援助是可行的”“执行旨在提高我们对他们的影响和控制的措施是必要的”^{[1]16},对盛世才明确予以支持。当年年底,苏联红军入疆,帮助盛世才击败了张、马两大势力,基本稳定了新疆政局。

盛主新初期,历经连年战乱后的新疆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亟待经济恢复和社会重建。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盛世才把争取苏联援助作为巩固政权的主要措施之一,标榜建设“新新疆”。在苏联帮助下,1934年初,盛提出“八大宣言”和“六大政策”。后者是其施政纲领,包括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个方面,其意在继续借助苏联力量开展各项建设,巩固政权。盛世才的全面亲苏政策获得了苏联方面的积极回应。1934年7月,苏共通过了《关于重建新疆经济的措施》,向新疆提供500万金卢布贷款,帮助新疆重建货币体系和推动工业、交通运输等行业建设^{[1]37-38},之后金额更增至750万,大批人才和项目随资金涌向新疆。彼时新疆教育落后,人才缺乏,盛世才为多方搜纳人才,向苏联请求援助,苏方派出大量专家、技术人员和一些留苏中共党员入疆帮助新疆恢复和发展经济。后来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大背景下,盛世才还向中共寻求建设人才,延安方面派出了一批以毛泽民为代表的优秀党员入疆。客观而言,三十年代中后期盛苏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盛所奉行的全面亲苏容共政策,为中共党员以合法身份入疆,担任实职并探索治理新疆提供了契机。

(二)入疆共产党员概略

抗战时期入疆的共产党员有前后两批。第一批由苏联派遣,入疆时间在1935—1936年,由25名滞留苏联的中共党员(也属联共党员)组成。为表示尊重苏方,盛世才对他们多予以重用,安排在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教育文化领域任职,委以秘书长、行政长、副行政长、县长等要职(见下表)。这些从苏联来疆参与建设的中共党员,为完善和贯彻“六大政策”,改善民族关系和发动民众等方面做出了努力,但他们入疆人数少、时间短。1937年10月盛世才为了强化其独裁统治炮制了“阴谋暴动案”,进行了第一次大清洗。原盛世才的总顾问,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被冠以“托派”的罪名。来自苏联的中共党员被重点打击清洗,俞秀松、张逸凡等四百余人被诬为“托派”“间谍”被捕,受牵连者多达两千余人,除赵实继续留疆外,其余来疆中共党员皆被遣返回苏。

第二批入疆的中共党员由延安中共派遣,入疆时间在1937—1938年间。“阴谋暴动案”后,盛巩固了其对新疆的掌控,但大清洗也造成了各级政府机构干部缺乏,为建设“新新疆”,解决经济建设中人才匮乏的问题,盛世才转而向中共请求帮助,“为了打通国际路线,解决革命根据地战略依托问题”^{[2]27},巩固与盛世才的统一战线,中共答应了盛世才的请求,陆续派出以毛泽民为代表的160名中共党员及其家属进入新疆^{[3]277},此次入疆共产党员人数多,时间长,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见下表:

表1 1935—1942年入疆任职的中共代表人物

姓名(化名)	职务
第一批来疆任职的中共党员代表	
俞秀松(王寿成)	反帝会的秘书长兼新疆学院院长
张逸凡(万献廷)	《新疆日报》社社长兼外交署署长,后改任喀什行政长
郑一俊(郑义钧)	和阗区行政长
张义吾	公安管理处处长

续表一

姓名(化名)	职务
任 岳(刘贤臣)	保安局副局长
稽 直(栾宝廷)	初任保安局侦审员,后改任交通处处长
赵 实(王宝乾)	历任奇台县县长,喀什行政长,1937年调任《新疆日报》社社长兼外交署署长
满素尔	《新疆日报》副社长
于成发	哈密警察局长
吴德铭(江泽民)	新疆汽车运输总局局长
赵国元(赵雨时)	独山子石油厂厂长
刘敬中(陈培生)	边务处第二副处长
第二批来疆任职的中共党员代表	
毛泽民(周彬)	先后任财政厅副厅长、代厅长和民政厅长
黄火青(黄民孚)	先后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阿克苏行署行政长
林基路(林为樑)	先后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库车县和乌什县县长
韩 光(韩明光)	先后任督办公署上校副官、新疆反帝会科长、布尔津县副县长
许 亮(鄯荣爵)	先后任麦盖提、蒲犁县(今塔什库尔干)县长
李云扬(李志樑)	先后任省立迪化一中校长、喀什区教育局局长、巴楚县县长
刘希平(刘西屏)	哈密行政长
胡 鉴(胡 栋)	先后任蒲犁边卡大队队长、边界委员
高登榜(高玉成)	先后任疏附、疏勒、伽师、英吉莎、蒲犁、乌恰地方税务局副局长、喀什区税务局副局长、财政局副局长
郑亦胜(郑正声)	先后任财政厅秘书和叶城税务局局长
蒋连穆(蒋春茂)	先后任库车、沙雅、拜城、轮台税务局副局长、焉耆财政局副局长
程九柯(陈九柯)	先后任阿克苏税务局副局长、莎车财政局副局长
罗乃棠(李华荣)	巴楚税务局副局长
陈广竹(陈解虚)	先后任和阗地税局副局长、墨玉县代县长
薛汉鼎(薛激刚)	先后任叶城、皮山税务局副局长、财政厅视察员
郝冰清(郝 升)	先后任焉耆税务局副局长、焉耆财政局副局长
黄永清	先后任于阗、策勒税务局副局长、洛浦县税务局局长
钱 萍(钱春申)	先后任莎车、阿克苏、于阗地方税务局副局长、局长兼和阗金矿局局长
徐梦秋(孟一鸣)	任教育厅副厅长及新疆学院院长(后叛变革命)
刘 勉	任迪化女子中学军事教官及新疆妇女协会宣传部长
马肇嵩(马 锐)	先后任和田教育局督学、代局长及博乐县教育科长
汪小川(汪哮春)	《新疆日报》副社长兼公安管理处职员训练班教官

续表二

姓名(化名)	职务
李宗林(李啸平)	《新疆日报》编辑长
朱旦华	省立迪化女子中学教务主任、新疆省妇女协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秘书长,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委员

资料来源:第一批党员情况参见白振声,(日)鲤渊信一.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页;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7册[M].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620页。第二批党员情况参见朱培民,王宝英.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史[M].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9页;段锐等.新疆与内地关系史[M].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226页;李宏主编,喀什地委史志办.喀什年鉴2000[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10页,有改动。(注:抗战时期历任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化名施平)、邓发(化名方林)和陈潭秋(化名徐杰)因未担任政府实职故未收录表中,其贡献亦有公论。)

上表中由延安派出的中共党员,大多接替第一批联共党员担任政府要缺,任职范围扩大到二十余县,从省城到地方都有共产党人奋战在各条战线上:或负责财政民政,如毛泽民;或总揽地方事务,如黄火青、林基路、赵实、李云扬、刘希平等;或主持群团和教育工作,如韩光、朱旦华、马肇嵩、汪小川、李宗林等;或负责宣传教育,如汪小川、李宗林等;还有分散在新疆各地负责税收工作的中共党员,如高登榜、郑亦胜、蒋连穆、程九柯、罗乃棠、陈广竹、薛汉鼎、郝冰清、黄永清、钱萍等,有力地推进了新疆社会经济面貌迅速发生变化。

二、中共参与治疆的实践

抗战时期新疆的全面经济建设始于1937年,这既是苏联帮助下新疆实施第一个“三年计划”的开端,也是第二批中共党员入疆的起始年份。入疆中共党员参与治理的1937—1942年,恰是民国新疆社会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他们皆具体参与实施了建设“新新疆”的第一个(1937—1939年)和第二个(1939—1942年)“三年计划”,开启了中共治理新疆的早期探索。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代表人物,是被称为中国红色金融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的毛泽民。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民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国际银行与经济部、财政部密切合作,发行货币、统一财政;长征结束后毛泽民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1938年2月毛泽民从延安赴苏治病途中,被盛委以重任,担任过新疆财政厅副厅长、代厅长与民政厅厅长,整顿新疆的财政金融和民政工作,推动了新疆工农牧业及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以毛泽民为代表的入疆中共党员治理新疆的探索与实践,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稳定财政金融。盛世才上台初期,为在军事上打击异己,掌控新疆而大肆滥发纸币,从1933年“短短五年功夫,乱发纸币达三百万万两,外债合法币两千余万两”^{[4]38},导致新疆财政入不敷出,纸币贬值,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普通老百姓生活艰难自不必说,政府工作人员也因物价飞涨,难得温饱。“公务人员的薪金,比从前曾增高到一二百倍(原文如此——作者注),而实际市上的物价乃增高二三百倍”^{[5]3479},纸币贬值严重到公务员工资用麻袋和人力车去拉钞。毛泽民根据新疆实际,开出“另起炉灶”治理新疆财政的药方:改组省银行,统一南北疆货币,建立预算制度,紧缩开支,整顿税务,增加财政收入等政策,为保证毛泽民财政金融政策的贯彻实施,中共还派遣了高登榜、郑亦胜、黄永清等10名搞财经的中共党员入疆,担任地方税务和财政部门的骨干,在短短三年时间内,毛泽民迅速稳定了新疆的财政金融形势,为新疆的各项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大搞地方建设。一方面毛泽民将“苏联所借的五百万金卢布几全数用之于生产事业”^{[5]3486},

还发行建设公债,为新疆的农牧业、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以及文化教育事业提供资金。在1941年2月调任民政厅长后,毛泽民主持制定了《新疆省区村制章程》,废除了乡约制度,实行民主选举,推行民主政治;另一方面勤政为民的地方长官如赵实、林基路、许亮、李云扬等共产党员,尽心竭力推动地方各项事业的发展。为振兴奇台商务,赵实呈请省府重开外蒙驮运商道,还出面组织商家集股开办电灯局、火柴厂、造纸局等工业。林基路在库车组织修筑了全长三千米的铜厂河石堤(北山龙口大坝),重修库车河大桥;许亮和李云扬开展大型水利建设,分别集资兴建了金银渠(19.5公里)和洪海子蓄水池,解决了制约当地农业发展的水源问题,李还率民众修建了170多公里的南疆公路。努力为民众办好事,办实事的共产党员们,也因此受到各族民众的热烈欢迎。

其三、发展文化教育。当时教育厅代厅长、新疆学院教务长、省立一中校长都是共产党人,在他们的推动下,盛世才政府不断加大经费投入,兴建学校,成立各民族文化促进会,入学学生概不收学费,文具膳食皆由政府免费提供,促进了各民族文教事业的快速发展。1938年全省共有学校1757所,在校学生138490人;到1942年,学校发展到2465所,在校学生总数达到271100人^{[6]73}。各地创立完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在各区治所城市先后设立简师、初中,创办暑期教员讲习会,推动地方教育的发展。社会教育方面则致力于在各县城举办民众夜校^{[5]3523}。赵实任奇台县长时,成立县立小学和满文小学,增设维吾尔族女生班和民众班,动员和组织成年男女识字,提倡师生演文明戏和话剧。

其四、宣传反帝爱国,发动群众,促进民族团结。新疆反帝联合会和《新疆日报》,成为中共发动群众,宣传反帝爱国的阵地。1934年成立的新疆反帝联合会,会长虽是盛世才,秘书长和下属部、科领导多为共产党员,仅1939年出版的《反帝战线》和《新疆青年》等旨在宣传反帝爱国的进步刊物,“总计数目达九万七千余册”,壁报画刊“数目至少在五十余种以上”^{[7]3581-3582}。新疆省、督两署机关报《新疆日报》,也由中共党员掌控,负责日报采稿、编审和出版等^{[8]前言},宣传反帝爱国,持久抗战。在搞好地方建设的基础上,入疆党员坚持民族团结平等,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如李云扬不吃猪肉,下令厨房将维、汉两族同志做饭炒菜用油及炊具、餐具分开,大大促进了民族团结。

入疆党员的早期探索实践,迅速取得了显著成效,新疆财政税收状况迅速好转,农、工、商、牧各业欣欣向荣。但对盛世才而言,确保其对新疆的独裁统治才是他所有政策的出发点,随着中共在新疆影响力的扩大,以及苏联对新疆军事、政治和经济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盛世才为确保其“新疆王”的独裁统治,在1942年10月趁苏德战争爆发,苏无力插手新疆之机转向国民党,再次发动“阴谋暴动案”,全面清除苏联在疆势力,同时开始血腥的反共整肃。毛泽民、林基路等主要干部被逮捕关押或惨遭杀害,中共参与治理新疆的早期探索被迫中止,这也直接导致新疆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在抗战后期陷入停滞与倒退。

三、抗战时期中共参与治疆的意义

抗战时期中共党员参与治理新疆的早期探索时间虽短,但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不仅推动了新疆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在新疆的传播,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进入新疆、治理新疆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借鉴。

(一)入疆共产党员积极宣传反帝爱国、抗战建新,对抗战胜利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入疆共产党员充分发挥了党的宣传组织优势,服务抗战伟业,在反帝爱国旗帜下,激发各族人民的反日热情,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由入疆党员主导的反帝联合会,各民族文化促进会,作为聚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爱国青年和民众的合法群众性组织,通过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促进了新疆的稳定与发展,

巩固了抗战大后方,各阶层都受此影响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大业。在入疆党员的努力下,1937年新疆派人护送一批有8万件黄皮衣、1万件马鞍和其他物品共80多辆汽车的物资到延安^{[3]279-280},有力支持了中共的抗日活动。被称为“新兵营”的西路军左支队,是中共抗战时期在疆的一支武装力量,也是新式军事人才的培训基地,训练特种技术兵种,战士们学习飞机、坦克、汽车、大炮、无线电通讯、医疗等先进技术,后奔赴抗日一线杀敌。1939年筹组的航空教导队,是由苏联出资训练中国飞行员,受训人数四百多,不仅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急需的飞行人才,也成为新中国组建空军的骨干力量之一^{[9]254}。

(二)入疆共产党员的治疆实践有力扩大了中共在疆影响,推动了马列主义的传播。虽然新疆紧邻苏联,但因杨增新实施可疑人员不许入境,政治宣传品不得进入新疆等措施^{[10]725},十月革命后新疆并未受马列主义影响。1922年《新疆与苏俄政府局部临时通商条件草案》第14条明文规定:“俄国对于新疆人民及旅俄华民不得传播社会主义”^{[11]276},严加抵制马列主义向新疆传播。然而这一局面至盛世才主新,因其奉行亲苏政策发生逆转。当时在疆党员虽奉行“三不”政策^{[12]240}(即不发展党员,不宣传共产主义,不发展党组织),但借助盛世才宣传“六大政策”的机会,大量出版马列主义的相关刊物和著作。中共还利用反帝会公开“讲授以马列主义为中心的各项理论”“各机关的干部和各部队的将领都争先报名入班受训”^{[7]3575},甚至“一批年幼的儿童,无论汉、维、回各族,都深深地染上马列主义的思想熏陶”^{[7]3938},其中包括三区革命的主要领导者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杜别克·奴尔塔扎·夏勒恒巴也夫、以及后来担任新疆主要领导职务的赛福鼎·艾则孜等,都受到马列主义的深刻影响。思想宣传配合入疆党员的有效治疆措施,加上新疆经济社会良好发展的局面,无不显著扩大了中共在疆的政治影响,也为建国后进军新疆,和平解放奠定了一定基础。

(三)入疆共产党员的早期探索为中共进行新疆城市管理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共在革命过程中,主要有城市与农村两种不同地理空间进行管理与建设的经验。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后,国民党控制了各级城市,中国共产党只能在农村创立革命根据地积蓄自身力量。盛世才主政初期引共产党员入疆,为中共提供了探索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的契机,毛泽东对城市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有着敏锐而清醒的认识。对毛泽民提出的相关要求,毛泽东大力支持,明确指示:“请陈云同志替他办,财政事情第一要紧,不但那里好,将来也大有助于我们”^[13]。城市建设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以工业化和边贸带动新疆城市发展的模式,对来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毛泽民等而言是新问题。抗战期间,苏联专家和入疆共产党员拟定了伊犁、迪化等重要城市实业计划发展大纲,实施了新城建设计划,兴建城市基础设施,开展工业化建设,兴建或扩充了迪化、伊犁等城市的44家工业企业^{[11]450-453},1937年即取得了突进式成果,“全疆小工业铺旧有二百七十三家,新设一百一十九家”^{[14]77},推动了新疆城市从传统向现代的进一步转型,还带动了周边农、牧、商业的全面发展。这一探索为中共积累了城市管理与城市建设的宝贵经验。

(四)入疆共产党员的早期探索,为解放后中共治理新疆提供了借鉴。

抗战时期毛泽民等入疆党员治理新疆的探索,是中共为了抗战胜利欲将新疆建设成为坚实的大西北基地所作的努力,也是中共认识新疆、了解新疆、治理新疆的初次尝试。中共的治疆之策经历了由初步探索、逐渐成形到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正是在借鉴汲取入疆党员早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新中国不仅彻底解决了新疆军阀割据的问题,全面实现了中央对新疆的管控,还努力营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为新疆的快速发展创造条件。

首先,为解决建国初期新疆的经济问题提供了有效方案。1949年底新疆甫一解放,彭德怀即上书毛泽东,指出新疆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财政经济问题”“新疆本身大约只能解决财政需要的百分之三十左右,百分之七十以上必须中央帮助”,财政收支极不平衡导致物价飞涨,“解放以来金融产生了严重波动,物价在这期间涨了一百倍以上”^{[15]38-39},这一情况类似当年毛泽民所面临的严峻局面。党中央

和新疆省府制定的施政纲领与当年毛泽民所实施的政策如出一辙:统一币制,整理财政,“建立预算决算审计制度,整理税收,实行合理负担,增加政府的收入,减轻贫苦劳动人民的负担”^{[15]47};曾任驻疆代表的陈云等提出“先拨黄金五千两,购拨汽车二百辆,在今明两年(指1950-1951年,作者注)中逐年拨给四五十万匹布、茶砖一千吨”,大力援疆的同时积极发展本地工业,“筹拨电力二千马力,纱锭二万、毛锭五千及一个皮革厂”^{[15]49}。这些正确的措施迅速稳定了经济形势,为新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为建国后中共治疆理政提供了有益借鉴。新中国延续了入疆党员治疆的优秀传统,实行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相结合的政策,“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15]143};继续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给予维族等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大量吸收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中共还吸取了因军阀政治导致中共治疆探索被迫中断的历史教训,派王震率十万农垦大军进驻新疆,发展生产,保障政治稳定。

再次,在继续发挥新疆地缘优势,积极巩固和发展中苏友好,争取苏方援助的同时,也吸取历史教训,注重自力更生,加强新疆和内地的关系。“凡我们自己已经有了的或能从其他地区调拨的机器、材料就不要再进口,凡我们自己能够找到的专门技术人员就不要再从苏联请人来,凡能够因陋就简地设备起来的工厂、房舍就不要另起炉灶或照最高的标准来修建”^{[15]64}。

四、余论

抗战时期中共党员在新疆的探索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苏联模式在新疆的预演,抗战时期的这一实践证明苏联模式可以在短期内取得迅速的成效,这对建国后毛泽东等人选择争取苏联帮助,走苏联计划经济的建设模式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只是抗战时在新疆实施的“三年计划”,改成了“五年计划”。

中共党员参与治疆不只对建国后中共治疆有借鉴意义,它还为抗战结束后中共战略中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开展现代城市管理与城市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被迫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直到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宣布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到城市,二十多年间中共的城市建设与管理经验极为有限,此前虽在江西瑞金、陕北延安等革命根据地进行过小规模的城市建设,但均属革命战争时期以乡镇和小县城为主的城市建设与管理,地域有限,人口不多。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的城市建设探索都无法与抗战时期在新疆建设现代城市的探索相提并论,它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占领张家口和石家庄等大城市后进行城市管理,制定相关城市政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借鉴与经验。

更为重要的是,抗战时期中共党员在新疆的探索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前第一次大规模合法介入多民族地区治理及边疆治理的早期探索,时间较长,成效显著,之前中共虽有在瑞金、延安等根据地治理的经验,但皆属内地,以汉族或汉族为主的地区,地域范围也没有新疆广阔。故以此观之,抗战时期入疆中共党员的治疆实践,事实上具有超乎新疆辐射全国边疆多民族地区的范本意义,它所提供的经验,对于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制定少数民族政策及边疆开发政策,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沈志华. 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

- [2]朱培民,王宝英. 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史[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
- [3]白振声,(日)鲤渊信一. 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 [5]张大军. 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册[M]. 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
- [6]程东白. 十年来新疆的文化教育事业[J]. 新新疆,1943(1).
- [7]张大军. 新疆风暴七十年:第7册[M]. 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
- [8]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日报社的活动[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 [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 新疆简史:第三册[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 [10]新疆省督军杨增新关于严防俄国革命传入中国致外交部等电(1920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 [11]厉声.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 [12]陈潭秋. 陈潭秋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13]毛泽民. 致洛甫、泽东同志信(1938年4月18日)[A]. 中央档案馆.
- [14]陈纪滢. 新疆鸟瞰[M]. 北平:建中出版社,1943.
-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The Research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overnance of Xinjiang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Fu Juan Wang Hongyun

(Sichu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Chengdu 610021;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engdu 610225, China)

Abstract: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Sheng Shicai, who is the governor of Sinkiang province administration, carried out the policy of keeping good relationship with Sovie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u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taking part in governing Xinjiang.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represented by Mao Zemin began to explore how to manage Xinjiang. Its significance was not only for construction of Xinjiang at that time, but also for government of Xinjiang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offered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shift of strategic center from rural to urban. It also is the early stage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o first massively and legally governed the multi-ethnic border areas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et a precedent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explore the administr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the border areas.

Keywords: anti-Japanese wa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njiang; governance

[责任编辑:左福生]